



# 终究,月随人归

蒋为民

得知吴贻弓老师辞世的消息,是在中秋节次日上午9点左右。其时,我正在全国高教影视学会的年会上,看到手机上的新闻报道和吴老师在病榻上手书的“上海电影万岁”六个颤巍之字,孱弱之躯写下的这六个字,竟然有着雷霆万钧的力量,瞬间击中了我的心,令我百感交集。

在我的记忆里,中年时的吴老师不是一个喊口号的人,温文儒雅,和善从容,声音里带一点独特的沙哑。这几天来,因为他的离世,我看了很多纪念他的文章、照片和视频。其中最令我感动的是他获颁中国电影导演协会终身成就奖的那一段视频。他捧着艺术女神的奖杯,一字一句地说:“真的,我们都十分热爱这个由我们自主选择职业,所以,当我们也绝不会辜负它。今天,我想在当话后再加上四个字,那就是:电影万岁!”每一个吐字声都真诚,用心,荡气回肠。越到老年越有激情的吴老师,是不是因为知道自己和电影一生的缘分终将渐行渐远,他需要把这一生的热爱毫无保留地告诉给世人?

1988年秋,我有幸作为上海师范大学中文系的直升研究生,成为吴老师的第一位研究生,研究方向是电影评论。当我得知这个消息的时候,心里不知有多么喜悦!为了我的提前入学,原本只招收一名研究生的吴老师还提出这样对其他人不公平,于是,系里又破例增加了一个名额,由吴老师和系主任王纪人联合招生。就这样,我和来自重庆的杨志勇成为了吴老师的第一届研究生。

因为当时吴老师既是上海市电影局局长,又是上海电影制片厂厂长,还是中央候补委员,工作十分繁忙,但是,对于我们这两个开门弟子,他是十分上心的;首先是开了一个长长的书单,要求我们精读。我记得是22本电影理论方

面的书,其中有几本书,不仅学校图书馆没有,连位于徐家汇的艺术书店里也买不到,估计是他在“文革”前上大学的时候读过的理论著作。由于他公务繁忙,我们上课并不能保证每周一次,基本上是去上影厂的办公室或在吴兴路的家。上课方式是我们俩汇报读书心得,他结合书目给我们亲自传授对电影艺术的理解,有时也对我们的习作提出修改意见。每次去吴老师家,美丽的师母张芙蓉总是笑意盈盈地迎接和招呼,让我们倍感亲切。记得他家隔壁住着的时任上海市广电局局长兼上海电视台台长龚学平——正是我毕业后投奔的电视行业的大领导。说起来,不是我有“二心”,而是命运弄人。我真正想去的地方是上海电影艺术研究

所,专门从事影评评论。但研究生毕业时,刚好高校开始实行研究生自主就业政策,学校不包分配,而吴老师所在的上海市电影局当年没有招聘硕士的名额,他居然就“大义灭亲”,直接“灭”了我当影评评论家的梦想——现在想想,也真是难能可贵的清正廉明!

作为电影评论专业的硕士研究生,我最幸运、最有价值的学习经历,是跟随吴老师在《月随人归》摄制组完整地见习了全程拍摄。这种特殊待遇也是真正体现了吴老师培养人才的务实风格。1990年,也是9月,秋高气爽,当我迈着轻快的步伐第一次走进漕溪北路595号上影厂4号棚,心里的那种庄重和自豪无以言表。当年,《月随人归》的摄制组很精干。也许因



吴贻弓开怀瞬间 祖忠人 摄



《月随人归》工作照:中为吴贻弓,左为摄影师夏力行,右为副导演成家骥

## 老师吴贻弓的三重境界

潘争

9月14日是今年中秋假期的第二天,一般而言,我习惯在假期睡个懒觉。可是,就在这天早晨,我却莫名其妙地早早醒了过来,顺手拿起手机打开微信,就看到了上海电影评论学会会员群里朱枫会长留的短短七个字“永远怀念吴导演”……确认了消息之后,我呆呆地坐在沙发上,半天没回过神来。

在过去三十多年,我与吴老师并没有太多个人交往,但“吴贻弓”这个名字,对于我或我们上海戏剧学院86级电影导演班来说,是“精神教父”一般的存在。我的手指下意识地在手机日历上划拉了无数下之后,思绪飞速回到了1986年9月1日。那天正好是星期一,也是我们进入大学后的开学第一天。全班20名经全国三个考区筛选考入该班的学生,整齐地坐在上戏华山路校区主教学楼红楼的一间教室里,讲台四周站着来自上海戏剧学院和上海电影制片厂的主课老师们。在班主任的介绍下,一位我以前在《大众电影》照片里看到过的戴着黑框眼镜的儒雅高个中年男子从老师中慢慢走了出来,沉着地走上了讲台,以平稳的语气开始了他的讲话。他就是著名电影导演、我们班的创始人、时任上海市电影局局长的吴贻弓先生。

吴贻弓先生站在讲台上说了许多话,而我能记得的也就是以下三点。首先,他引用了王国维广为人知的人生三境界来描述我们将来的艺术道路。其二,他告诫我们,不要今天急着做明天的事,应该首先把今天的事情做好。其三,任何生活经历无论是好是坏,对电影导演而言,今后都是财富。最后这点,显然是针对他自己早年的坎坷经历有感而发。

看得出,这篇长长的训词是他酝酿已久的。半小时左右的时间里,虽然他语调和缓、情绪平稳,但似乎是想把对于艺术和人生的全部感悟灌输给我们,其语态并不太像是老师,更不像领导,却像是一位对孩子寄予很大期望、同时又生恐孩子在未来生活中犯错误的父亲。

说完这番话后,他便适时结束了第一课,在礼貌地与周围的老师们告别后,走出教室。

在以后的四年中,吴贻弓先生很少在公开场合出现在我们班同学中间,但他的影响力和关切却是无所不在。除了先后调集上影厂一批优秀创作人员如著名导演叶明、李歇浦、吴天忍、傅敬恭、摄影师张元民、郭烈康、美工师金琦芬、录音师吕家进、编剧斯民三、剪辑师蓝为洁、电影理论家杨仲文等来担任各门专业课程的授课教师,还请来倪震、周传基等北京电影学院名教授专程来沪为我们讲课。有两次,不知他通过什么渠道半路“拦截”了一个叫汤尼·雷恩的英国人和另一位马龙·白兰度的同班同学来了几天课。

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极为有限的教学条件下,我们班每个学生都有一张上影厂颁发的贴有照片的“观摩证”。凭着这张证,我们能在永福路52号上影文学部、新光电影院、淮海中路电影局等几处看到那时在上海能看到的几乎所有内部参考片,平均每周观片量达六部之多。如果上海举办外国电影周,我们甚至能在一天内看到六部电影(早、午、晚各两部)。应该说,比之北京电影学院,上戏办电影导演专业班有着学术和教学设备上的先天不足,为此,上海市电影局拨款专款给我们调拨了五台“海鸥-DF”照相机和五台“索尼”家用摄影机供摄影作业用。另外,我们还有每年一次外出实习,四年下来,我们班走遍全国各大省市,大大地开了眼界。现在想来,吴贻弓先生应该是尽可能利用了他当时所有的公私资源,尽了浑身解数,才给我们提供了当时上海滩所能有的最

好条件来进行电影专业的学习。

人称吴贻弓先生是“散文导演”,而他的儒雅气质也与这个称号颇为相符。我在公开场合随大流称呼他“吴老师”,私下就还是按照电影圈子弟的叫法叫他“吴叔叔”。从初次相见的1986年开始,我从来不曾见到吴先生高声大气、颐指气使的“导演风范”或“大官气质”。他说话的声音从来就不大,语调通常是非常平和的。在他从一位专业导演被破格提拔,直登局级位置后的初期,他依然住在位于南京西路江宁路“梅龙镇酒家”附近的“蜗居”中,上下班也还是骑着他那辆“老坦克”。据说,后因各种客观原因,吴老师这才“悻悻地”坐上了为他配备的小汽车。不过,在最初几年里,我曾注意到,他总是与司机并排,自己坐在副驾驶座上。我也曾无数次看到,当他在上影厂厂区内与桑弧、汤晓丹、谢晋、孙道临等老一辈艺术家交谈时,他近乎是“执弟子礼”,身体微微前躬,面带笑容,态度一直是谦恭有礼的。

吴贻弓先生是一位温文尔雅的“学者型导演”。吴先生最喜爱并被用在他的大作《城南旧事》里作为主题歌的李叔同创作的学堂乐歌《送别》,几乎成了我们的班歌。而这股“文人雅士”之气,不仅贯彻了《城南旧事》的始终,也深深渗入了我的创作理念中。

吴贻弓先生的创作理念和气质,深深影响了我们班学生的创作观和人生观。他多年以来给予我们的教诲,则是“身教多于言教”。自1992年出国以后,吴先生见面的机会就少了很多,在有限的会面中,有好几次居然是在机场。几年

为吴老师已经是德高望重的大导演,主创人员包括配合舞美、道具、化妆等的一班人都极为尊重他,整个摄制组给我的印象是无与伦比的和谐与默契。而吴老师对待每一位工作人员的态度也是完全平等谦和,从未见他有过大声说话的时候——基本上只有副导演和制片主任才会在现场大喊大叫。我记得当时吴老师想拍一部中国版的《月色撩人》,剧本是他在工作之余用了无数个夜晚熬出来的。故事是关于台湾老兵中秋时节返回大陆探亲、邂逅初恋、破镜重圆的故事,男主角是刚刚出演了贺龙军长的夏宗佑,两位女主角则是上影的张文蓉和向梅。这出戏的夜景很多,印象最深的一幕是在美琪大戏院拍戏,那天要等剧场的演出全部结束才能布光。等到布光完成,已经是子夜时分,南京西路、江宁路上一片寂静,夜幕下通体透明的美琪大戏院美轮美奂,宛如一位在家里点着灯期待归人的佳人。我坐在马路沿上呆坐了很久,感叹电影就是这样让平凡的事物变得梦幻。

由于我毕业之后很多年在电视台工作,内心多少有点耿耿于怀远离了电影。加上工作节奏之快,尽管老师的任何行踪我都会格外关注,但是去看望吴老师不多,提起他也不多,唯恐被人看成在借用老师的光环,但实际上,我在职场的一路上何尝不是被他的光环眷顾着?当然,我也一直很努力,从电视到视频网站,从文创基金到影视制作,始终不忘初心,也不允许自己辜负“吴贻弓”这三个字——直到几年前和师弟一起去看老师,吴老师和师母都对我夸赞有加,我这才知道原来他们两位也一直在关注我。我就像当年被老师表扬了一样,喜滋滋的。

命运很神奇。我在知天命的那年回归电影行业,重新走进漕溪北路595号的上影厂,今天又投身于电影教育领域,仿佛就是为了兑现吴老师那个“上海电影万岁”的理想。我所在的上海大学上海温哥华电影学院,是一个特别注重实操和动手能力的电影学院。这也很像一种轮回,正如当年吴老师带着我们去拍《月随人归》,我现在也接过了老师的一棒;而吴老师,则在中秋之后的清晨,永远地,随着皓亮的满月而去了。

前,有一天下午,我从北京搭乘上航班机回沪,在候机大厅等待登机时,看到吴贻弓先生在工作人员陪同下从远处走来。彼时的先生已是白发苍苍,以前挺得直直的背已不由自主地有些弯曲,步履也变得蹒跚。上了同一辆摆渡车,我便马上走上去跟他打招呼。久未见面,吴老师很高兴,在短短十余分钟交谈里,我就记得他说的两句话:你们班的同学,现在无论还在不在从事电影工作,都干得不错!我现在搬到闵行去住了,变成“乡下人”了,你有空来玩。

貌似褒奖的第一句话,却有些刺痛我。因为在老师面前,我自己的工作做得再好,毕竟也是脱离了电影导演专业,这一直是我心里的一块隐痛。尤其当我在毕业二十余年后,作为一名跨国公司高管来面对曾经对我们抱以极大期望的吴贻弓先生时,他的鼓励却使我顿生惭愧。当时,我还陡然想起了他开学第一课上所说的那句话:“任何生活经历无论是好是坏,对电影导演而言,今后都是财富。”经过毕业后多年的闯荡,生活经历所给予我的“财富”倒是很有了些,就是不知道这“财富”到底几时才能“兑现”在我的电影梦上……

剩下的一路默默无语,而吴贻弓先生似乎也看出了我的心思,轻轻叹了口气,把头扭向车窗外。摆渡车很快开到了飞机前面,我扶着他上了飞机舷梯。由于先生和我分别坐公务舱和经济舱,下飞机时没再能有所招呼。不料师生就此一别,竟成永诀,他再未能看到我这个学生姗姗来迟但即将面世的作品……

“天之涯,地之角,知交半零落。人生难得是欢聚,唯有别离多。”老师走了,连一次让我们跟他最后告别的机会也没留下,就这么轻轻挥别他深爱的电影事业,飘然而去,一如我的同班同学梁山导演在微信同学群里所说的:“今天他在灯火阑珊处了……”

然而,在我们这些学生心中,吴贻弓导演的作品不朽,他对于电影的执着精神长存!老师一路走好!

说到铭文,实在包罗万象。古代的甲骨文、青铜器、墓志铭、砚铭都属于铭文范畴。而古代的青铜器大多属于祭祀用品,已经有成熟的文字与文风。

所谓砚铭,就是在砚上铭刻文字,在砚上镌刻姓名、字号或斋号,进而在砚上记录该砚的来源,对砚的开采、材质与形制加以描写和赞颂,也有读书人在砚铭中表达对事物和人的认知、感悟,阐明价值取向和道德情操等。这些砚铭的内容,是砚的使用者在砚上的留言,是自言自语,也是与时空对话,更是志向的铭刻。

一方砚石是亿万年的大自然结晶。砚农开采于深山,历经千辛万苦运出。历来开采砚石是项危险的工作,很多人为了之搭上性命。一块砚石到了砚工手里,有的依形就势,有的乘兴为之,有的则要放置很久,因为砚工需要相石、思考。等到一方砚石成形,砚工手上的老茧又增加几层。机缘巧合,砚石到了文人书斋当中,又经过年累月使用。文人之有砚,犹如美人之有镜。

唐宋以降,文人喜欢在砚台书写文字后铭刻。这种铭文文、抒其志之风,广为播散。宋代以文治国,文人地位空前,宋砚器形极简,尤显文气。砚铭便滥觞于宋代。大文人像欧阳修、苏东坡、黄庭坚、米芾等也参与到砚台设计以及铭文书写之中,有作品传世。

书斋里与文人朝夕相处的砚台,在文房四宝中的地位尤其特殊。砚质坚,不易磨损,不似其他“三宝”一直需要更替。砚台又称印墨侯,古代文人从第一天写字开始就需要日日磨墨、洗砚,砚台在使用中便日渐湿润,更为文人宝爱。文人于日课之际,常会拿出心爱的砚台铭刻。一些文人用砚或来自友人相赠,或取之名玩,或得于某段奇缘,他们遂将砚的来源刻于砚上,记述这段经历,并往往由此滋生出感怀。

砚以铭贵,我是这么认为的,也是这么实践的。这几年,我刻过百多方砚铭,在刻时都慎重对待,生怕弄巧成拙。砚铭并不是抄一首诗词那么简单,也不是铭个“上善若水”“金石永寿”那么简单。砚铭已经如同岁月一样静好,我们就要为之赋予生命,让它活得更久远。一方好的砚铭让人拍案叫绝,爱不释手,反之令人生厌,弃之如敝屣。本来刻砚铭是玩的,没想到在朵云轩办过一次展后,有好事者约我继续玩下去。看来不止我一人意犹未尽。

随着深入砚铭,常在反思。都说砚铭是死亡的艺术——因为现代社会书写功能退化,很多年轻人已不用写字,只用智能手机“码字”。相对于器物日新月异的社会,磨墨写字太奢侈了。既然奢侈,便成了小众的东西。砚铭若即若离的存在,无疑又是一场对于人的考验。有朋友跟我说,看到一些老师题写的文词实在不通,也无关砚台本身,简直是暴殄天物。举目海内,我们常常发现以识字而自居“文化人”者多而文人少。有学历未必有文化,如今甚至还有很多自诩“名士”者拿着笔墨在挥洒着“艺术人生”,但他们唯一的诉求不过是赚得盆满钵满。若干年以后剩下的是什么?怕是飘飘然的砚台。

砚铭是有温度的,值得现代人去琢磨、研究。砚铭是有生命的,值得现代人去传承。文心是纯粹的,文人又是不群的。在这个炎热将尽的初秋,挥汗铭刻,于我是件痛快的事。

艺思

砚铭

罗启程

解忧日报 消费市场 专版

刊登内容

金银首饰 百货卖场 休闲旅游  
儿童用品 食品餐饮 建材装潢  
体育健美 超市促销 家具厨卫  
家用电器 婚纱摄影 品牌人物  
酒类饮品 医药保健 教育出版

电话: 021-22898552

上海 1931

吴基民 编

拯救牛兰夫妇

佐尔格以其天才的间谍才能,很快建起了一个情报网。同时他也得到了中共方面的大力支持。周恩来亲自为他挑选助手,据张文秋回忆,1931年9月底的一个下午,周恩来亲自带张文秋来到佐尔格寓所,把张文秋交给了佐尔格,并对他说:你点名要谁,我就给你调谁来。以后,周恩来陆续给他调来了张放,无线电奇才蔡叔厚、章文仙等。其中尤其是吴仙青,在莫斯科读书时,就参加了共产国际的工作,深受别尔津的青睐。他们帮助佐尔格建立了佐尔格情报网的中国组,作出了重大贡献。

佐尔格的努力很快就取得了成效,由于他德国记者的身份以及杰出的交际能力,他很快与德国驻华外交官以及蒋介石身边的德国顾问团建立了联系。从1930年至1932年,他的谍报小组给苏军情报局发出了597份电报,通过苏军情报局转给中共中央有335份,尤其是德国顾问团制定的对中央苏区4次“围剿”的情报,为中国革命作出了重大贡献。

在宋庆龄北上见面蒋介石失败以后,佐尔格奉别尔津亲自给他下达的命令,在上海开展营救牛兰的活动。作为苏军总参谋部最高级别的间谍,佐尔格自然知道牛兰夫妇的真实身份和他们确切承担的工作。共产国际远东局1931年初在上海的正式代表是德国人罗伯特,1931年2月罗伯特离开上海,远东局的工作就由秘书波兰人任斯基主持,从顾顺章叛变,向忠发被捕,一直到牛兰被捕,始终没有音讯过。

牛兰夫妇音讯全无,生死未卜,佐尔格确定自己的第一项工作是确定牛兰的生与死。他问佐尔格小组的其他成员:有什么方法建立起与国民党中央特务的接触与联系,以确定牛兰的生死?他的中国同志方文(又名张放)说:他的学生柳忆通,现在浙江乐清老家,与同为乐清人的张冲可能有些关系。于是佐尔格便指示方文通过这个关系与张冲接触一下,试探试探。几天以后,柳忆通向方正汇报:张冲不仅知道牛兰的下落,而且正是国民党当局负责牛兰案的主管。

其实方文和柳忆通走的是张冲同学郑空性的关系。郑空性与张冲是在温州市读书时的同班同学好友,1924年他加入中国共产党,还曾担任过中共潮汕地委的宣传部长,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因病回籍,与组织失联。郑空性一听打探牛兰的消息,即刻从乐清赶到了南京(以上见马雨农《张冲传》)。

张冲见到兴冲冲地从乐清赶来的老同学郑空性来打探牛兰夫妇的消息,他表面上不露声色,心中却欣喜万分,他明白,鱼上钩了!

很快郑空性与张冲会面的信息通过方文,传到了佐尔格耳中;牛兰夫妇活着,就关在南京。

但佐尔格并不相信,他一定要拿到牛兰还活着的真凭实据,才能依此作出下一步的行动。于是他要求方文告诉郑空性,从监狱里拿到一张牛兰亲笔写的纸条。

于是信息又传给了张冲,张冲一口答应,但开出了一个条件:要想拿到此货,必须支付两万美元。

两万美元,这在当时是一个天价!张冲之所以开价两万美元,其目的就是为了探明:与他打交道的是谁,是中共中央,还是共产国际首脑机关?因为其他人根本拿不出这笔钱!如果与他打交道的人,真的愿意掏出两万美元,从而也从反面证实那位关在牢里、严刑拷打也始终只承认自己是泛太平洋产业同盟驻上海的一个秘书的牛兰,肯定是一个大角色。

用两万美元换一张牛兰写的小纸条的事,在佐尔格小组里引起了激烈的争论。方文在他晚年的回忆录《佐尔格在中国》与《红色国际特工》一书中是这样写的:“两万美元,是多大的一笔钱,能用为革命做多少事呀!而现在毫不痛惜地用这么大一笔钱买一张小小的纸条,未免太不爱惜革命财产了!”

佐尔格则认为:“张冲在中统内有一定地位,他没有拒绝我们的要求,说明他

有意和共产党保持一定的关系,如果这笔交易成功,既有了牛兰的纸条,又等于我们已经收买张冲为我方的情报员。”佐尔格又提醒方文:“究竟是金钱重要,还是牛兰的生命重要?舍不得钱,就不能得到证据。你必须认清,政治交易不能用金钱计算。”

在花钱买纸条这件事情上,佐尔格赢了,他说服了方文。但是在评估张冲这件事情上,他输了。他一开始就有利用国民党的腐败、花钱收买国民党高官的设想,但他低估了张冲。

佐尔格向莫斯科别尔津汇报了的想法,别尔津一口答应,他回复佐尔格讲,通过银行汇这么大的一笔款子已经不保险,他决定派两名德国老共产党员作为交通员,每人携带两万美元,从西伯利亚越境到哈尔滨,然后从大连坐日本人的船到上海,只要有一个人成功,就能救出牛兰!这两个交通员一个叫赫尔曼·西伯勒尔,另一个叫奥托·布劳恩。

两个德国交通员先后到上海,见到了佐尔格。赫尔曼在晚年他的回忆录上写道:在一所公寓里,他见到了佐尔格。他紧紧拥抱着自己心目中伟大的英雄,交了钱,第二天便启程返回莫斯科。而奥托·布劳恩借口要和他在莫斯科的老熟人,现已担任中共中央负责人的博古见面,而耽搁了下来。

钱拿到了,佐尔格通过中间人对张冲讲:要先验货再给钱。张冲倒也爽快,一口答应了佐尔格的要求。于是几天以后,一张宽两厘米、长不过六七厘米的纸条放在了佐尔格的手里,纸条并非非常短的一句话,写些什么未见披露。佐尔格迅速拿去给熟悉牛兰笔迹的人检查,确认无疑,3天后把两万美元托中间人给了张冲。这真是间谍史上最昂贵的一笔交易。

(十五) 连载